

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

张海东 石海波 毕婧千

提要：本文考察了社会质量研究的两个独立的起源，对各自的概念、理论和方法等进行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文章还着重分析了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在亚洲的推进情况，指出目前国内社会质量研究无论在概念还是理论体系和方法上，都是欧洲社会质量的移入而不是本土社会质量的学术承继与发展。无论是欧洲的社会质量研究，还是欧洲社会质量移入过程中本土化的努力与尝试，目前社会质量研究还存在很多局限。

关键词：社会质量 欧洲社会质量 亚洲社会质量 社会质量本土化

社会质量有两个独立的起源。一是生长于中国本土的社会质量的概念和理论；一是源于欧洲的社会质量概念、理论和指标体系。目前国内的社会质量研究更多地将目光集中在欧洲移入的社会质量，试图在国内推进西方社会质量范式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一、社会质量的提出和早期研究情况

根据现有的文献，社会质量的概念最早由王沪宁提出。1989年他在《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一文中明确提出并阐述了社会质量的概念。王沪宁从中国建立新政治秩序的条件和可行的选择视角，指出“任何社会政治秩序的格式和发展，都与该社会所提供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不要超越社会条件去推行某种秩序，否则不仅新秩序不能建立，而且社会也不会因此进步。”“我这里把前述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对一个社会的设定，归之为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的概念，即社会质量（Quality of Society）”。接着，文章界定了社会质量的概念：“所谓社会质量，指的是社会非政治有序化程度。非政治有序化程度指的是社会各个环节、各种运动和各种因素自我组织的

* 本文获 2011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1&ZD148），感谢《社会学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设性评审意见。

程度，即在没有政治控制和协调下它们的自组织达到何种程度。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政治的有序化社会，一类为非政治的有序化社会。在这两大类中，各有高低之分，结果我们得到两大类、四大基本类型：（一）政治的有序化低的社会；（二）政治的有序化高的社会；（三）非政治的有序化低的社会；（四）非政治的有序化高的社会”（王沪宁，1989）。他认为，中国社会历来是第二种类型，能否从第二种类型过渡到第三种类型或是第四种类型目前尚难定论。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就测量社会质量的指标进行了探讨。文章把社会质量指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性的指标，主要有历史发展的道路、经济发展的水平、人口、沟通、教育、文化，另一类是价值性指标，具体包括整合、自主、自律、稳定、适应、开放。作者指出，“物质性指标和价值性指标综合运动，作用于社会质量”（王沪宁，1989）。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王沪宁还就社会质量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制约、社会质量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动态平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沪宁，1991）。

继王沪宁提出社会质量之后，吴忠民于1990年在《论社会质量》一文中从社会哲学的视角对社会质量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他看来，“所谓社会质量，是指社会机体在运转、发展过程中满足其自身特定的内在规定要求和需求的一切特性的总和。”文章分析了社会质量具有的三个特征：“第一，它所反映的是同一时代的条件下，社会机体的实际状况同自身内在的最佳规定要求及最适合需要之间的吻合程度；第二，社会质量虽不直接反映‘时代’状况，但毫无疑问，它是附着于‘时代’内容的；第三，它所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品格”（吴忠民，1990）。

吴忠民还就社会质量这一概念及有关命题的意义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就研究意义而言，在理论方面，社会质量的研究可以丰富社会学学科的内容，有助于深化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为社会研究方法的更新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思路；在现实方面，它可以提醒人们在建设现代化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机体自身的完善，它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就研究内容而言，他指出，“社会质量这一课题所包括的内容极为丰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内容的研究。一类是有关社会质量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侧重这样一些内容的研究：社会质量的基本特性、基本品质问题；社会质量的分类问题；影响社

会质量的各种因素、变量等。另一类是有关社会质量问题的应用研究，这主要是指：关于社会质量的测量方法及指标体系（包含客观指标体系和主观指标体系）；对于社会质量理想模型的设计及其具体的技术性方法；对于社会质量进行国别性的研究；优化社会质量的具体措施等等”（吴忠民，1990）。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论》一书（吴忠民，1995）中，吴忠民明确提出将社会质量作为衡量社会完善与否的重要尺度。应该说，吴忠民对社会质量研究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阐述，为开展社会质量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本土的社会质量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这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有关。当时的中国，在人们的观念中经济增长是发展的第一要务，社会发展问题刚刚引起人们的重视，社会发展的质量问题还远远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还没有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在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引入之前，对本土的社会质量做出了积极回应的文章（例如，杨晓莉，1999）仅属于凤毛麟角，并不多见。

学者们对社会质量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就理论层面而言，这些极有前瞻性和预见性的研究开启了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视角，两位学者对社会质量的具体理解各不相同，但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社会质量的提出意味着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发展的质量问题。这与我国经济改革早期关注速度，注重“快”，而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人们又不约而同地提出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类似，人们逐渐认识到，不是“快”就“好”，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又好又快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经济的共识。在社会发展研究领域，学者们较早地关注社会发展的质量问题，这在理论上为社会发展研究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奠定了基础。

就实践层面而言，社会质量的提出者都意识到开展经验研究的必要性，通过指标体系的设定对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进行度量，并依据这种度量来判定社会发展的程度。虽然两位作者在具体指标的考量上没有深入探讨（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研究主旨所在），但是对测量社会质量的主要指标维度还是指出了方向。应该说这些维度虽然不够全面，但极为重要，为后来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实证研究所广为采纳，也是时下决策部门衡量社会发展状况并制定相关政策依据的重要维度。

二、欧洲的社会质量研究

(一)欧洲社会质量提出的背景

社会质量的另一个起源是欧洲的社会质量研究。1997年1000多名欧洲学者在阿姆斯特丹通过一项宣言，即《欧洲社会质量的阿姆斯特丹宣言》。《宣言》给出了提出社会质量这一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的根本动机：“考虑到所有市民的基本尊严，我们声明：我们不想在欧洲城市目睹日益增长的乞讨者，流浪汉，我们也不希望面对数量巨大的失业群体，日益增长的贫困人群，以及只能获得有限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人群。这些以及其他指标都表明欧洲社会为所有市民提供社会质量不足”（Beck et al.,2001:375）。

欧洲学者提出社会质量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地位在欧洲的上升，欧洲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间的不均衡关系日益强化。新自由主义排斥社会性，将社会政策置于从属于经济政策的地位。“在欧洲语境下，社会政策通常被民族国家以及地区和地方当局等同于社会管理，通过收入转移以维持社会经济保障，最初是雇员的社会经济保障，后来扩大到全体公民的社会经济保障。”这种经济价值观主导下，“经济系统中运行的问题被方便地定义为‘社会问题’并被化为‘外在性’问题”（沃克，2010）。对社会政策和（暗含的）社会性从属于经济增长这个中心目标的批判，是社会质量得以提出的重要背景。

(二)欧洲社会质量的概念和理论化

根据欧洲学者的定义，“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Beck et al.,1997,2001: 6-7），按照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家们的观点，这些福祉和潜能都源自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因此，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关系的质量对促进人们参与社会发展以及个人社会进步的和发展的程度，没有社会关系将不会有个人的福祉与发展。

欧洲理论家们认为，社会质量的本体论基石就基于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存在而不是原子化的经济人假定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有赖于社会认可，也就是说，人的自我实现源于他们在大量的集体认同（诸如家庭、社区、公司、机构）中与他人的互动。所以自

我实现过程和集体认同形成过程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当然为了参与这些过程，人们必须具有自我反应能力并且与之互动的集体认同必须是开放的。“社会性”就根植在这些相互依赖的过程中。这些相互依赖过程发生的领域体现了两种重要紧张关系的互动：正式的系统世界和由家庭、群体和社区构成的非正式的生活世界两者之间的水平方向的紧张关系、以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两者之间纵向的紧张关系（参见图1）（沃克，2010）。

在创造和评价社会质量方面，欧洲学者着重考虑了三组因素（见表1）。首先是建构性因素，这是在横跨两种重要紧张关系中，自我实现过程与各种集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互动的结果。这些带来合格的社会行动者的构成：个人（人的）安全，关乎法律规则的制度化；社会认可，关乎社区成员个人之间的尊重；社会响应，关乎群体、社区和系统的开放性；个人（人的）能力，关乎个人的生理和精神方面的能力（沃克，2010）。

其次是条件性因素，社会质量的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四个方面的条件性因素。

一是社会经济保障，指人们获取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会人进行互动所必须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能性。社会经济保障指向的是社会正义，以抗拒社会给个人造成的风险。二是社会凝聚，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整体性和维系基本价值规范。社会凝聚指向的是团结和整合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分化或分裂。三是社会包容，指人们接近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包容关乎个体平等的权利和价值以减少社会排斥。四是社会赋权，指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社会关系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社会赋权关注的是社会为个人发挥自身能力而提供的生活机会是否公平，它指向人的尊严（张海东，2011c）。

最后是规范性因素。在将建构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连接起来的基础上，规范性因素被用来判断社会质量的适当性和必要性程度。这些规范性因素包括：社会正义，对应社会经济保障；团结，对应社会凝聚；平等价值观，作为对应社会融合的一个标准；人的尊严，对应社会赋权（沃克，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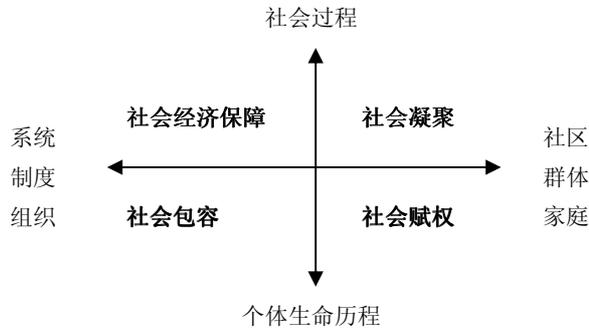
表 1 社会质量的结构

建构性因素（进程）	条件性因素（机遇+偶然）	规范因素（取向）
个人（人类）安全	社会经济保障	社会正义（平等）
社会认知	社会凝聚	团结
社会反应	社会包容	平等价值观
个人（人类）能力	社会赋权	人的尊严
（评估这些因素性质的外在印象）	（量化这些因素性质的指标）	（判断建构性因素和条件性因素之间联系结果的标准）

资料来源：范德蒙森、沃克，2011。

如果用一个类似数学象限的构图来表示就能更加清晰地说明社会质量的理论架构。在这个构图中，作为横轴的X轴的左端代表的是制度、系统和组织世界，横轴的右端代表的是群体、社区和家庭。作为竖轴的Y轴下端代表的是个人的生命历程，竖轴的上端代表的是社会过程。在这个框架图中，一方面表示的是宏观（社会）和微观（个人）的纵向关系，另一方面，则是系统、制度和组织与群体、社区和家庭之间的水平关系。纵轴代表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横轴则代表制度进程与个体行动之间，即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两种持续存在而有密切相关的紧张关系产生了一种动力，影响着个体的自我实现和集体认同的形成，并将社会行动者转化为能够实现社会质量的行动者。当然，象限图中的每一个象限本身即代表着一个连续的系统：社会经济保障与不安全；社会整合与分化；社会融入与排斥；个人的自主与依赖（张海东，2011c）。

欧洲社会质量有其独特的理论架构，其出发点是消解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矛盾，解决制度世界（亦即系统、制度和组织）与生活世界（即社区、群体和家庭）的冲突，从而改善社会状况，继而提升个人的福利和潜力。在坐标图的四个象限中，“如果着眼于社会体系，制度和组织体制等社会环境因素，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人们生活所提供的社会经济保障的水平和程度反映出来。但如果着眼于个体，该社会的社会质量也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个人提供的进入社会体系的机会，开放度，以及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来反映。”（林卡，2010a）



资料来源：沃克，2010。

图1 欧洲社会质量的理论架构

（三）欧洲社会质量的测量领域和指标体系

在社会质量测量和指标方面，欧洲学者根据对四个条件性因素的解析分别给每个因素建构了测量的领域，在每个领域下又区分了不同的子领域，并为每个子领域设定了具体的指标。欧洲社会质量指标总共由 95 个指标构成（指标内容可参见 Beck et al.,2001），其具体结构包括：

1. 社会经济保障因素

测量的领域包括金融资源、住房与环境、健康与照顾、就业和教育五个方面。其中，金融资源领域包括收入充足性和收入保障两个子领域共3个指标，住房与环境领域包括住房保障、住房条件、环境条件三个子领域共6个指标，健康与照顾领域包括健康供给保障、健康服务和照顾服务三个子领域共5个指标，就业领域包括就业保障和工作环境两个子领域共7个指标，教育领域包括教育保障和教育质量两个子领域共3个指标。

2. 社会凝聚因素

测量的领域包括信任、整合的规范与价值观、社会网络、认同四个方面。其中信任领域包括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两个子领域4个指标，整合的规范与价值观领域包括利他主义、宽容、社会契约三个子领域共9个指标，社会网络领域包括网络一个子领域共3个指标，认同领域包

括国家/欧洲的认同、区域/社区/地方认同、人际关系认同三个子领域4个指标。

3. 社会包容因素

测量的领域包括公民权、劳动力市场、服务和社会网络四个方面。其中公民权领域包括宪法/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公民权利、经济的政治的网络四个子领域8个指标,劳动力市场领域包括获得有偿就业一个子领域2个指标,服务领域包括健康服务、住房、教育、社会照顾、金融服务、交通、公民/文化服务七个子领域12个指标,社会网络领域包括邻里参与、友谊、家庭生活三个子领域5个指标。

4. 社会赋权因素

测量的领域包括知识基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开放性和支持性、公共空间、人际关系五个方面。其中知识基础领域包括知识应用、信息的可获得性、信息的方便性三个子领域6个指标,劳动力市场领域包括雇佣合同控制、工作流动前景、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三个子领域共7个指标,制度的开放性和支持性领域包括政策系统的开放性和支持性、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和组织的开放性三个子领域共3个指标,公共空间领域包括对集体行动的支持和文化丰富性两个子领域共5个指标;人际关系领域包括支持个人生理的和社会自立的服务、个人服务的支持、社会互动的支持三个子领域共3个指标。

通过上述的条件性因素中的不同领域及子领域和具体指标的设定,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完成了其详细而丰富的指标体系的建构。

(四) 社会质量在欧洲的推广和应用

为了使社会质量研究在欧洲有实质性的推进,1997年6月欧盟成立了“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EFSQ)以推动社会质量的研究。自成立以来,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使社会质量研究的影响逐步扩大。

2001年以前,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致力于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研究并在2001年最终形成了明晰的社会质量四个条件性因素,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1997年,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出版了社会质量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欧洲社会质量》(Beck et al.,1997),对社会质量的理论、研究领域政策取向等进行了探索。在此期间,为了集中发表社会质量研究的最新成果,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自1999年起出版《欧洲社会质量期刊》(*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Quality)，截至 2006 年，该杂志已出版 6 卷共 7 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社会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 年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又出版了社会质量研究的第二本著作《社会质量：欧洲的视角》(参见 Beck et al.,2001)，该书着重阐述了社会质量的概念、理论和政策相关的问题。2001 年至 2005 年，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上来，并最终形成了上述 95 个指标构成的完整的指标体系并进行经验研究。2006 年以后，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则致力于在亚洲和国际社会上拓展社会质量研究和以此为核心的政策取向的推广。

在欧盟内部，社会质量提出后许多国家按照统一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衡量各自的社会质量，并据此对有关社会政策进行调整。2005 年，在“欧盟委员会执委会研究总署和第五框架方案”提供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等 14 个国家相继发表了本国的社会质量报告，国际社会福利委员会 (ICSW)和欧洲反贫困网络 (EAPN) 两个国际 NGO 组织也参与了该项目，欧洲反贫困网络还对这些报告进行了比较研究 (EAPN,2005)，据此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政策建议。

批注 [y1]: 参考文献中无，请补充

在经验研究方面，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 2004 年起就与海牙市政府就“城市发展和地方治理”开展合作研究，合作包含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为核心，组织深度访谈；第二阶段，以城市发展为主题，开展了 LAAK NOORD 城市计划。该研究为地方政府的治理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依据。这项研究也是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将社会质量指标应用于城市的一个典型案例(Ogawa, 2007)。

(五) 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启示

经过十余年的探讨，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一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并重。欧洲社会质量与其他一些衡量社会进步的研究取向(例如生活质量)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它试图构建一个完整、连贯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社会质量的提出者不仅从社会哲学的视角，挖掘社会质量的本体论基础——社会性(Gasper,2009)，还从谋求解决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自我实现与集体认同等问题入手，阐述其所涉及社会哲学问题。在理论的建构上，欧洲社会质量理论不仅仅考察了其构成中的最重要

因素——条件性因素，而且深入研究了这些条件性因素得以成立的建构性和规范性因素，并在三者之间建立起紧密的逻辑联系。

在将社会质量理论化的基础上，欧洲的理论家们将社会质量的条件性因素操作化，转化成为可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体系，并将这些指标应用于经验研究领域，从而获得丰富翔实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可以用于测量一个社会的具体的社会质量状况，还可以为社会质量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修订提供经验支撑。

二是明显的社会政策取向。社会质量研究不是象牙塔内的智力游戏，它从一开始诞生之时就被赋予了更新社会政策的使命。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社会质量的政策领域极为广泛，它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解决欧洲的社会问题，扭转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的局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政策领域包括经济政策、社会政治政策、文化政策和环境政策等。可以说，无论是在城市发展、社会发展、公民权、社会团结方面，还是就业、教育、老龄化等问题上，社会质量的一整套概念工具都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欧盟也将社会质量的政策建议进行过实质性的推进。不仅在欧盟内部，实际上联合国这样一些国际组织也试图采用社会质量的概念工具用以解决具体问题。例如，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关于老龄化的计划也考虑采用社会质量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政策有效性的指标，其他几个政策框架也采纳了社会质量。2006年7月于上海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专家组会议形成的报告中，社会质量的概念和行动主体占据了核心部分，本着确立高水平的会议日程的宗旨，对上海实施策略应用于马德里和澳门老龄化行动计划进行了地区性回顾，因此可以说，社会质量概念与亚太地区所有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评价和提高密切相关（Ogawa, 2007）。

三是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局限。目前社会质量研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虽然很多学者仍然在进行不懈的探讨。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也正是社会质量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例如，在理论上，如何进一步深化社会质量的理论体系，解决制度世界如何干预生活世界甚至使其殖民化的问题、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行动者的功能和结构问题、质量和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结果的社会质量和作为过程的社会质量统一的问题等等。除了理论上的问题之外，社会质量研究还在方法上容易使人困惑，例如社会质量研究和生活质量研究、人类发展研究、人类安全研究、能力理论、社会资本理论（Gasper et al, 2008，

2009)乃至幸福指数等研究的区别上,尤其在方法论的区别还不够清晰,甚至有些从事社会质量研究的学者也不甚了解。不清楚这些研究取向之间的差别和界限,或者它们之间互相联系的领域何以生长出不同的取向。第三,在社会政策领域,欧洲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切实可行而又有效的社会政策?这个问题和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模式相关联。原来意义上的欧洲并不包括东扩后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欧洲社会质量的提出者也在问自己,西欧模式能在真正的意义上代表欧洲模式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基于统一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经测量而形成的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就难以令人信服。

(六) 社会质量研究在亚洲的推进

社会质量在亚洲的推进可以通过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理清其路径和逻辑。

欧洲社会质量研究走出欧洲开始在亚洲扩展始于 2006 年,主要的推动者是日本千叶大学的小川哲夫(Tetsuo Ogawa)。2006 年,日本千叶大学与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合作召开了“基于关系基础上的社会正义、平等和民主的人类福利与公共政策:建立可持续福利社会亚洲面临的挑战”,这也是亚洲社会质量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讨论了比较视角中的欧盟和亚洲社会政策,探讨了迈向“可持续福利社会”的政策取向。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搅动了亚洲社会学者,由此,亚洲社会学者开始关注社会质量这个全新的研究范式。在实践层面,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也开始考虑并论证将社会质量应用于艾滋病策略的可能性。

亚洲社会质量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于 2007 年在台湾举行,会议主题是“社会质量与可持续福利社会”,会议由台湾大学主办,其他多所高校和地方政府的研究部门参与了该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亚洲可持续福利的概念,也提出探讨建立亚洲社会质量指标的议题。同年底,由台湾行政院资助的委托研究报告发表,报告就台湾社会质量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相关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陈小红,2007)。

亚洲社会质量的第三次国际会议于 2008 年在南京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亚洲和欧洲的社会质量:探寻增进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之路”(中文会议名称为:社会质量研究和社会福利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就社会建设和促进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的社会质量和相关社会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也涉及 NGO 和社会赋权等议题(EFSQ,2011)。

南京会议是国内组织召开的第一次有关社会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对社会质量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影响。

亚洲社会质量的第四次国际会议于 2009 年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社会发展和人类安全：社会质量观点和亚洲条件。会议讨论了社会质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以及亚洲社会质量的条件。

社会质量研究在亚洲扩展过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研究特点。一是在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下，各地结合本土社会的特征开展研究。例如，在韩国，很多学者聚焦在风险社会和风险政治这一研究主题；在泰国，学者们关注从社会质量的视角衡量民主质量；在日本，学者们较多地从社会质量的视角关注老龄化问题；在中国，学者们侧重从社会质量的视角解读和谐社会建设。二是注重欧洲社会质量指标的本土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经验研究。2009 年，亚洲社会质量研究者在韩国首尔召开亚洲社会质量标准问卷（SQSQ）的国际研讨会，会议就亚洲社会质量的指标进行了深入研讨并最终形成标准的亚洲社会质量调查问卷。2010 年开始，一些国家和地区依据首尔会议形成的标准问卷进行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学者们就调查指标和数据中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并在千叶大学召开国际研讨会。2011 年，首尔大学再次召开“亚太社会质量比较”国际研讨会，就亚太地区的第一轮社会质量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研究。

三、大陆社会质量研究现状及反思

目前国内有关社会质量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在亚洲推进后的产物。换言之，国内目前的社会质量研究是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本土化尝试和努力，而不是作为国内最早提出的社会质量的学术承继和发展。令人遗憾的一点就在于，国内学者最早提出了社会质量这个范畴，而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呼应。反倒是西方社会质量研究的亚洲扩张，使人们在热炒欧洲范式的同时，将这个原本产于本土的研究范式从束之已久的高阁中翻检出来。即便如此，迄今国内关于社会质量的研究主要仍是沿袭欧洲的话语体系，而不是本土的。欧洲版本的社会质量研究在国内的研究现状可以大体概括如下：

（一）欧洲社会质量在大陆的最早传播

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在国内学界最早的传播始于 2006 年，在杨团、关信平主编的《当代社会政策研究》一书中发表了艾伦·沃克的《21 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一文(沃克，2007)，作为社会政策领域的重要文献，该文又被收录在 2007 年出版的《社会政策评论》(第一辑)中。这是国内有关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最早的文献。2007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艾伦·沃克和小川哲夫举办了“社会质量理论与应用”的学术讲座。艾伦·沃克着重介绍了社会质量的理论架构，小川哲夫则以“社会质量与其对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潜在角色：发展社会质量指标以期构建和谐和谐社会”为题发表了演讲。这意味着日本学者小川哲夫是较早考虑将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构联系起来思考的学者之一。大陆欧洲社会质量研究主要推动者是林卡教授，他最早撰文探讨中国的社会质量问题(Lin & Gabe, 2007)。2008 年南京大学会议则是国内第一个有关社会质量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

（二）大陆社会质量研究现状

近年来，大陆学者推进社会质量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发表了研究成果 40 余篇(部)。而且社会质量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社会质量研究的有蓬勃兴起之势。概括起来，大陆社会质量研究有如下特点。

1. 对欧洲理论、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行译介

2009 年，林卡教授发表《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理论》一文(林卡，2009)，该文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文献。张海东在《社会》发表了《90 年代金融危机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文章运用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和韩国统计数据分析了金融危机对韩国社会质量的影响以及韩国社会政策的转向(张海东，2009)。其后，张海东(2010a, 2010b, 2011b)、韩克庆(2010a, 2010b, 2010c)、林卡(2010b)先后发表多篇文章，从不同的视角介绍欧洲社会质量研究。2010 年两篇重要的社会质量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发表，一篇是艾伦·沃克的《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沃克,2010)，该文深入阐述了欧洲社会质量理论与应用于亚洲的前景，另一篇是王卓祺的《治理视角下的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的比较分析》(王卓祺,2010)，该文从治理的视角对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

2011年由张海东主编的《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一书也正式出版，该书收录了国内外社会质量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献（张海东，2011d），为社会质量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2. 研究欧洲理论和指标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探索本土化路径

在这方面，林卡教授在反思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前提下，从社会质量理论、指标和政策导向三重意义上分析了社会质量的适用性（林卡，2011a, 2011b），进而深入探讨了将社会质量应用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分析这一新视角可能带来的前景（林卡，2010a；林卡、高红2010），并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和前景来剖析从提升生活质量到增进社会质量的意义所在（林卡，2011c）。张海东则从社会发展研究范式转换方面剖析了社会质量研究的理论价值（张海东，2010c），从理论上解读了社会质量对社会风险的应对（张海东，2011c）和社会质量的价值维度（张海东，2011e）。周小毛、何绍辉、杨畅等围绕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与评价指标体系问题，探索了社会质量中国化的问题（周小毛等，2011）。

3. 尝试运用欧洲的指标体系开展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

在经验研究方面，2009年林卡教授主持了浙江省300个样本的社会质量问卷调查，对在国内开展社会质量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林卡、柳晓青、茅慧，2010）；2010年张海东主持了上海社会质量研究，开展了1203个样本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研究报告即将正式出版；袁浩、马丹（2011）、张海东（2011a）分别基于上海数据开展对社会质量的实证研究；杨建华（2011）、深圳社科院课题组（2011）则分别基于浙江和深圳的经验开展社会质量研究。

在政策研究方面，韩克庆（2011）、高红、刘凯政（2011）、赵怀娟（2011）分别从社会福利改革、包容性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启示的角度探讨社会质量的政策取向。谢海峰（2010）、蒋占峰、张栋（2011）、宁亚芳（2011）等分别运用社会质量理论对农村扶贫事业发展、农村和谐文化建设和残疾人福利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政策探讨。郑造桓主编的《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一书从“社会质量与社会福利”、“社会质量与社会保障”、“社会质量与社会政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质量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潜在应用价值，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和具有重要参看价值的政策建议（郑造桓，2011）。

（三）大陆社会质量研究现状反思

欧洲社会质量移入中国后的蓬勃发展（从概念系统和理论框架来看不是本土社会质量的复兴）与当下中国具体的社会情境是分不开的。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丛生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意义的突显，这些都为社会质量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同时，各级政府为贯彻和谐社会战略近年来纷纷转向关注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等具体的社会建设目标，社会质量为这种转向注入了新的内容，因而一经引入就受到关注。

但是，反思几年来国内社会质量研究，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果不能超越和解决其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研究将有可能走入困境。

首先，社会质量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在，社会质量研究还处于译介阶段，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大部分研究成果的主题聚焦在对欧洲社会质量的概念、理论、方法和指标等的移译，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又突出体现在对社会质量的四个条件性因素的依赖上，还没有完全从欧洲社会质量框架中还没有跳出来。所以，很多文章的内容读者感觉雷同，这与起步阶段研究的译介性质有关。

其次，社会质量的理论研究还没有取得重大的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说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没有超越欧洲学者设定的框架的话，那么，如何从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质出发解读社会质量理论的研究也不多见。而且，如前所述，欧洲社会质量理论自身也不是完备的。这对社会质量的研究者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课题。社会质量研究本土化过程中，必须在理论上寻求突破，包括与国内学者最早提出的社会质量理论的对接，否则社会质量研究将因缺乏创新而失去活力。

再次，对欧洲社会质量指标的适用性问题也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基于欧洲特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境下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在很多方面不适合亚洲。即使经过改造后的亚洲社会质量问卷SQSQ，也未必适合中国的社会语境。重要的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模式，亚洲社会内部的异质性也非常高。所以，对欧洲社会质量指标乃至修订后的亚洲质量指标的改进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将中国社会特质这样的中国元素体现在社会质量的指标体系中是国内社会质量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还有，在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社会质量研究何以能够以及何种程度上能够为决策咨询服务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困扰社会质量研究者的

问题。欧洲社会质量研究的始作俑者是欧盟，欧盟内部有具体的机制可以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上达至决策层。在我国，这种机制和渠道何以可能恐怕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毕竟，社会质量研究的取向是以社会政策的改进为目标的。

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将欧洲的社会质量研究与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统一起来，这恐怕是国内社会质量研究的学者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一个是欧洲社会发展的理念和政策工具，一个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虽然学者们提出了将社会质量作为和谐社会研究一个新视角，但是似乎离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段距离。尤其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社会、文化等中国社会特质因素在评价我国社会质量中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也要充分予以考虑和深入研究。此外，在解决两个概念系统或两套话语系统之间的联系问题时，似乎也不能完全离开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毕竟，社会质量研究不是纯理论领域内的课题。

参考文献：

- 陈小红，2007，《我国社会品质发展现状及未来相关发展议题》（委托研究报告），（台湾）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编印。
- 范德蒙森，劳伦·艾伦·沃克，2011，《社会质量研究比较的视角》，载张海东主编《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高红、刘凯政，2011，《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中国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学习与实践》第2期。
- 韩克庆，2010a，《社会质量理论：一个研究综述》，《东吴学术》第1期。
- ，2010b，《社会质量中国化面对的社会背景》，《中国社会报》，4月19日。
- ，2010c，《提升社会质量的重要途径》，《中国社会报》，5月10日。
- ，2011，《社会质量理论：检视中国福利改革的新视角》，《教学与研究》第1期。
- 花菊香，2011，《灾害社会救助中保障、凝聚、包容和增能之整合路径》，《社会科学》第12期。
- 黄夏先，2011，《推动经济质量与社会质量协同提高》，《湖南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 蒋占峰、张栋，2011，《社会质量理论视阈下的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探索》第5期。
- 林卡，2009，《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理论》，载彭华民主编《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论国家、社会、体制与政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 2010a，《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 ，2010b，《为中国社会质量把脉》，《中国社会报》，2010年5月24日。
- ，2011a，《社会质量理论原型及其对于亚洲社会的适用性》，载张海东主编《社会质量研究：

- 理论、方法与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1b，《社会质量理论及其对于分析亚洲社会的适用性》，载王卓祺主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福利制度：全球化、文化与政府角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 ，2011c，《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前景：从提升生活质量走向增进社会质量》，《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6期。
- 林卡、高红,2010,《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第3期。
- 林卡、柳晓青、茅慧,2010,《社会信任和社会质量：浙江社会质量调查的数据分析和评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 宁亚芳,2011,《从社会质量视角看残疾人福利制度改革》，《中国残疾人》第9期。
- 深圳社科院课题组，2011,《社会发展质量内涵与社会建设路径》，《深圳特区报》8月2日。
- 唐钧,2008,《“社会质量”发展了社会政策的理论体系——在“社会质量和社会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南京大学。
- 王沪宁，1989,《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社会科学》第6期。
- ，1991,《社会质量与政府职能转变》，载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政府机构1991年》，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
- 王卓祺，2011,《治理视角下的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的比较分析》，冯希莹译，《江海学刊》第3期。
- 沃克，艾伦,2007,《21世纪的社会政策：最低标准，还是社会质量？》，《社会政策评论》（第一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0,《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张海东译，《江海学刊》第4期。吴忠民，1990,《论社会质量》，《社会学研究》第4期。
- ，1995,《中国社会发展论》，第六章“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195-208页），长沙：湖南出版社。
- ，2002,《社会政策缺位将降低社会质量》，《领导决策信息》第20期。
- 谢海峰,2010,《社会质量理论指导下我国农村扶贫事业发展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第6期。
- 杨建华,2011,《“十二五”浙江：推进社会转型，提升社会质量》，《观察与思考》第2期。
- 杨团、关信平,2006,《当代社会政策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杨晓莉,1999,《社会质量：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 袁浩、马丹,2011,《社会质量视野下的主观幸福感——基于上海的经验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 张海东,2009,《90年代金融危机对韩国社会的影响》，《社会》第1期。
- ，2010a,《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野》，《光明日报》2月16日。
- ，2010b,《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30日。
- ，2010c,《从发展道路到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式转换》，《江海学刊》第3期。

- , 2011a, 《2010 年世博会与上海社会质量》, 上海大学文科发展研究院主编《后世博与上海发展》,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 , 2011b, 《从社会质量看国民幸福》, 《文汇报》2011 年 4 月 4 日第 6 版。
- , 2011c, 《社会质量视角中的风险应对》, 《江海学刊》, 2011 年第 3 期。
- , 2011d, 《社会质量研究: 理论、方法与经验》,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 , 2011e, 《社会质量与社会公正——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年第 4 期。
- 赵怀娟, 2011, 《“社会质量”的多维解读及政策启示》, 《江淮论坛》第 1 期。
- 郑造桓, 2011, 《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周若辉, 2010, 《社会质量: 深化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企业家天地(理论版)》第 9 期。
- 周小毛、何绍辉、杨畅, 2011, 《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理论与评价指标体系初探》,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6 期。
- Beck, W., L. van der Maesen & A. Walker(eds.) 1997,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 The Hague, London,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Beck, Wolfgang, Laurent J.G. van der Maesen, Fleur Thomese, Alan Walker (eds.)2001, *Social Quality: A New Vision for Europe*. The Hague, London,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 EAPN 2005, "EAPN Report: European Network Indicators on Social Quality."(www.socialquality.org).
-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EFSQ) 2011, *Annual Report 2009/2010: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www.socialquality.org).
- EFSQ/ACSQ, 2010, *Draft First Newsletter on the European and Asian/Asian Social Quality Work*. The Hague, Seoul: EFSQ/National Seoul University, December.
- Gaspar, Des 2009, "The Human and the Social: A systematized Comparison of the Discourse of Human Development, Human Security and Social Quality."The Fourth Asian Social Quality Conferenc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The Social Quality Perspective and Asia Conditions. National Institution of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Thailand. December.
- Gaspar, Des, Laurent van der Maesen, Thanh-Dam Truong & Alan Walker 2008, "Human Security and Social Quality: Contrasts and Complementarities." Working Paper 462, ISS, The Hague.
- Lin, Ka & Karen K. Gabe 2007, "Social Quality in China: A Reflection to the 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sian Conference on Social Quality and Sustainable Welfare Societi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Ogawa, Tetsuo 2007, "A New Perspective on Ageing: Social Quality and Its Potential Role for Public Policy Making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Paper presented at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the Regional Preparations for the Global Review of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Bangkok,

Thailand. March 27-29.

The First Asian Social Quality Conference 2006, Human Welfare and Public Policy under Social Justice,
Equity and Democratic based Relationships: Asian Challenges for establishing Sustainable
Welfare Society. Chiba University, Japan. March.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张海东）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石海波、毕婧千）
责任编辑：杨 可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